

家庭环境及应对方式对大一新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吕婧 曹建琴 才运江 王晶

163319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护理学院心理教研室

通信作者: 曹建琴, Email: cj338@163.com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18.09.008

【摘要】目的 探讨家庭环境、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及应对方式在家庭环境对焦虑、抑郁情绪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机制。**方法**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对大庆市某大学1 950名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结果** 收回问卷1 902份,有效问卷1 846份,有效率为94.67%。男生471人(24.15%),女生1 432人(73.44%)。与男性相比,女性大一新生的家庭环境量表的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组织性、控制性维度得分及积极应对得分更高($P < 0.05$)。家庭环境各维度与应对方式、焦虑、抑郁情绪得分显著相关($P < 0.01$)。家庭环境对大一新生焦虑、抑郁情绪影响符合部分中介模型,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23.158、16.252,拟合优度指数(GFI)=0.947、0.960,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GFI$)=0.893、0.921,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108、0.090,提示这两个模型拟合度均较为理想。**结论** 家庭环境、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情绪显著相关,家庭功能可以直接影响大一新生的焦虑、抑郁情绪,也可以通过应付方式间接的影响的焦虑、抑郁情绪。提示要重视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指导与矫正,对于提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家庭环境; 应对方式; 焦虑; 抑郁; 大学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6YJCZH002)

Mediating effects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oping style on the emo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freshmen

Lyu Jing, Cao Jianqin, Cai Yunjiang, Wang Jing

Psycholog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School of Nursing, Daqing Campus,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Daqing 1633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ao Jianqin, Email: cj338@163.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coping styl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coping style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environment affec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 950 freshmen from a university in Daqing were investigated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nd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Results** Among 1 902 recycled questionnaires, there were 1 846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4.67%. In all the students, there were 471 male (24.15%) and 1 432 female (73.44%). Compared with male, female freshmen scored higher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conflict, success, organization, control dimension and positive coping ($P < 0.05$). All dimensions of family environment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oping styl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P < 0.01$).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freshme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as partially mediated. Chi square freedom ratio (χ^2/df) was 23.158 and 16.252;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was 0.947 and 0.960;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was 0.893 and 0.921; Root mean square error approximation ($RMSEA$) was 0.108 and 0.090.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itting degree of the two models was ideal. **Conclusion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oping style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amily function can directly affect freshme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rough coping style. It is suggested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guidance and corre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ping styl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Family environment; Coping style; Anxiety; Depression; College students

Fund progra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6YJCZH002)

进入大学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对学业的要求提高, 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要求也

提高了, 学习内容的结构性降低, 广度和深入增加, 使得学生面临更多学习上的困难, 因而对于大学生

而言,尤其是大学新生,面临学业发展、环境适应等诸多问题,容易产生抑郁、焦虑情绪,进而影响学业成就^[1-2]。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家庭环境是个体形成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和良好行为习惯以及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3]。以往研究发现,造成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家庭环境是重要的一方面,而个体的抑郁情绪是由家庭环境因素的不协调所致。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看,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应激结果紧密相关,而应对方式作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因素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4]。

目前,已有学者针对不同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家庭环境对大一新生焦虑、抑郁不良情绪的影响,且尚无研究考察应对方式在家庭环境与焦虑、抑郁关系中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构建家庭环境通过应对方式来影响焦虑、抑郁的中介模型,探讨家庭环境、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情绪间的关系,以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新的切入点。依据中介效应分析理论^[5],提出以下假设:H1大学生家庭环境能直接影响焦虑、抑郁情绪;H2大学生应对方式能直接影响焦虑、抑郁情绪;H3大学生家庭环境可以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焦虑、抑郁情绪。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对大庆市某大学2017级全部(1950名)新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问卷1902份,回收率为97.54%,有效问卷1846份,有效率为94.67%。其中男生471人(24.15%),女生1432人(73.44%)。

2.方法:(1)家庭环境。采用费立鹏等^[6]修订的《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进行评估,量表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10个分量表,共90个是非题,若回答“是”记为“1”分,回答“否”记为“2”分。按量表规定计算各分量表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家庭在该方面的特征越突出。各维度内部一致性在0.63~0.92。(2)应对方式。采用由解亚宁^[7]编制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评估,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积极应对因子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因子由条目13~20组成。问卷为自评量表,采用4级评分,包括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4个选项。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重测相关系数为0.89,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3)焦虑水平。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评估,含有20个反映焦虑主观感受的项目,每个项目按症状出现的频度

分为4级评分,其中15个正向评分,5个反向评分^[8]。请参与实验的同学根据最近1周实际情况填写。根据结果得到SAS粗分,再折算成SAS标准分,SAS标准分<50分为无焦虑,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 ≥ 70 分为重度焦虑。(4)抑郁水平。抑郁自评量表(SDS)用于测量成人抑郁症状轻重程度的自评量表^[9],是一种自评式量表,评定时间跨度为最近1周。该量表含有2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1~4分),主要评定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总分乘以1.25得标准分,评分<50分者无抑郁;50~59分为轻微至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 ≥ 70 分为重度抑郁。

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大学生的量表得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家庭环境、应对方式及焦虑、抑郁的相关性,通过回归分析明确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运用Amos 21.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应对方式在家庭环境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不同性别大一新生各量表评分比较:见表1。结果表明,男性与女性大一新生在焦虑、抑郁、亲密度、独立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和消极应对方面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男性相比,女性大一新生的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组织性、控制性、积极应对得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1 不同性别大一新生各量表评分比较(分, $\bar{x} \pm s$)

项目得分	男生(n=471)	女生(n=1432)	<i>t</i> 值	<i>P</i> 值
焦虑自评量表	38.49 ± 7.683	38.49 ± 8.222	0.160	0.987
抑郁自评量表	42.64 ± 8.528	42.23 ± 8.620	0.889	0.374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				
亲密度	8.25 ± 1.307	8.23 ± 1.478	0.263	0.793
情感表达	5.84 ± 1.495	6.18 ± 1.487	-4.319	<0.001
矛盾性	2.24 ± 1.855	2.44 ± 1.905	-1.982	0.048
独立性	5.28 ± 1.436	5.31 ± 1.350	-0.466	0.641
成功性	6.19 ± 1.582	5.74 ± 1.662	5.184	<0.001
知识性	4.33 ± 2.269	4.32 ± 2.303	0.042	0.967
娱乐性	6.01 ± 2.360	5.86 ± 2.333	1.283	0.200
道德宗教观	5.20 ± 1.513	5.14 ± 1.432	0.731	0.465
组织性	6.76 ± 1.767	6.39 ± 1.953	3.619	<0.001
控制性	3.35 ± 1.822	2.94 ± 1.758	4.266	<0.001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积极应对	25.80 ± 5.119	26.86 ± 5.013	-3.986	<0.001
消极应对	8.35 ± 4.225	8.22 ± 3.904	0.583	0.560

2.应对方式与家庭环境各维度、焦虑、抑郁的相关性:见表2。大一新生的积极应对得分与焦虑、

表2 大一新生应对方式与家庭环境各维度得分、焦虑、抑郁的相关性(r值)

项目	焦虑	抑郁	亲密性	情感表达	矛盾性	独立性	成功性	知识性	娱乐性	道德宗教	组织性	控制性
积极应对	-0.346 ^a	-0.446 ^b	0.209 ^a	0.198 ^a	-0.147 ^a	0.080 ^a	0.131 ^a	0.336 ^a	0.286 ^a	0.152 ^a	0.238 ^a	0.115 ^a
消极应对	0.333 ^a	0.299 ^a	-0.180 ^a	-0.131 ^a	0.257 ^a	0.013	-0.113 ^a	-0.194 ^a	-0.160 ^a	-0.114 ^a	-0.208 ^b	0.024

注：^a $P < 0.01$, ^b $P < 0.05$

抑郁评分和家庭环境的矛盾性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 < 0.05$), 与家庭环境其他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 < 0.01$); 消极应对得分与焦虑、抑郁评分和家庭环境的矛盾性、成功性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 < 0.01$), 与家庭环境的亲密性、情感表达、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和组织性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 < 0.05$)。

3. 家庭环境、应对方式对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见表3、4。以家庭环境各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为自变量, 以焦虑和抑郁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矛盾性、情感表达、组织性、控制性、知识性、亲密性、成功性、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焦虑水平有影响; 亲密性、知识性、情感表达、组织性、矛盾性、娱乐性、控制性、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抑郁水平有影响。

表3 家庭环境、应对方式对焦虑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项目	B值	S.E.	β 值	t值	P值
家庭环境					
矛盾性	0.629	0.110	0.147	5.698	< 0.01
情感表达	-0.691	0.126	-0.128	-5.464	< 0.01
组织性	-0.748	0.110	-0.177	-6.823	< 0.01
控制性	0.420	0.104	0.093	4.047	< 0.01
知识性	-0.325	0.083	-0.092	-3.922	< 0.01
亲密性	-0.564	0.156	-0.100	-3.616	< 0.01
成功性	0.316	0.107	0.065	2.965	< 0.01
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	-0.571	0.032	-0.357	-17.828	< 0.01
消极应对	0.689	0.041	0.344	17.182	< 0.01

表4 家庭环境、应对方式对抑郁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项目	B值	S.E.	β 值	t值	P值
家庭环境					
亲密性	-0.501	0.164	-0.084	-3.062	< 0.01
知识性	-0.495	0.098	-0.132	-5.064	< 0.01
情感表达	-0.899	0.133	-0.156	-6.780	< 0.01
组织性	-0.614	0.114	-0.137	-5.393	< 0.01
矛盾性	0.422	0.114	0.093	3.702	< 0.01
娱乐性	-0.362	0.094	-0.099	-3.850	< 0.01
控制性	0.224	0.108	0.046	2.083	< 0.05
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	-0.775	0.033	-0.456	-23.707	< 0.01
消极应对	0.676	0.042	0.314	16.299	< 0.01

4. 应对方式在家庭环境与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见图1、2。图1为家庭环境、应对方式影响焦虑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 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23.158、拟合优度指数(GFI)=0.947、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GFI$)=0.89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108, 该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同时家庭环境对焦虑有直接影响($\beta=-0.19$, $P < 0.05$); 积极应对对焦虑有直接影响($\beta=-0.28$, $P < 0.05$); 消极应对对焦虑有直接影响($\beta=0.29$, $P < 0.05$); 家庭环境可以通过积极应对间接影响焦虑($\beta=0.104$); 家庭环境可以通过消极应对间接影响焦虑($\beta=0.067$)。图2为家庭环境、应对方式影响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 $\chi^2/df=16.252$ 、 $GFI=0.960$ 、 $AGFI=0.921$ 、 $RMSEA=0.090$, 该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同时家庭环境对抑郁有直接影响($\beta=-0.25$, $P < 0.05$); 积极应对对抑郁有直接影响($\beta=-0.35$, $P < 0.05$); 消极应对对焦虑有直接影响($\beta=0.25$, $P < 0.05$); 家庭环境可以通过积极应对间接影响抑郁($\beta=0.144$); 家庭环境可以通过消极应对间接影响抑郁($\beta=0.063$)。

讨论 焦虑和抑郁均为一种复合型负性情绪, 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焦虑是个人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危险或威胁的情境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不愉快的复杂情绪; 而抑郁则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作为社会中的年轻群体, 大学生正处于生理成熟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的时期, 面对来自环境、人际关系、学习、就业等多种压力, 部分大学生无法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面对, 导致抑郁焦虑症状出现^[10]。有研究报道^[11], 焦虑和抑郁是目前高校大学生的主要心理问题, 并且发现近年来大学生焦虑水平正逐年上升^[12]。本研究结果显示, 男生与女生在焦虑、抑郁得分上差异不明显, 但在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组织性、控制性、积极应对得分上女生更高, 分析原因可能是女生有内心冲突时更倾向于与家人和朋友倾诉, 更多地寻求社会支持有关。

家庭环境与焦虑、抑郁的关系。家庭是一个人生后直接接触到的生活环境, 满足了人们发展的最基本需求, 对个人生理、心理的发展起着重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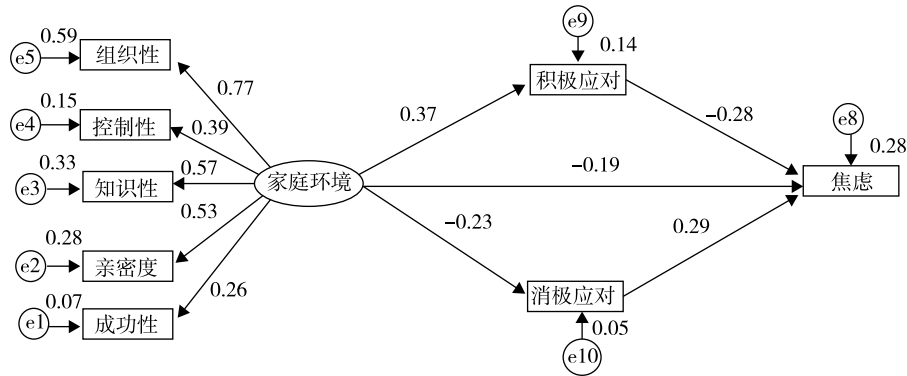


图 1 家庭环境对焦虑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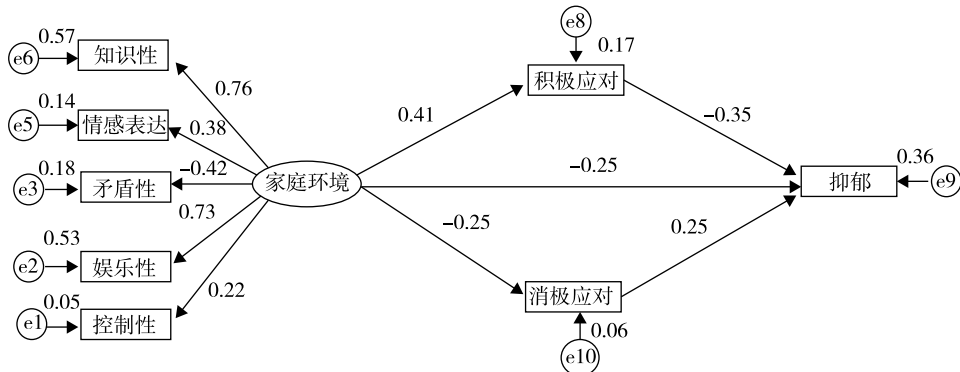


图 2 家庭环境对抑郁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与焦虑和抑郁情绪呈负相关, 家庭亲密度越好, 大学新生的适应性越高, 有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概率越低,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3]。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性, 家庭成员之间的娱乐性, 家庭成员之间的组织性与抑郁程度息息相关, 家庭成员亲密度越好, 娱乐性越高, 组织性越完善, 家庭成员出现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的概率越低^[14]。即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 改善家庭环境对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提高家长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另一方面, 学校应主动与学生家长建立亲密的联系, 以提高家庭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家庭环境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应对得分与家庭环境各维度均有相关性, 消极应对与除独立性以外的维度有相关性,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5], 良好的家庭功能有利于积极应对方式的建立^[16]。这说明亲密和睦的家庭氛围以及家庭成员参加各种娱乐或社交活动, 能使个体形成良好的心态, 增强积极面对事件的处事方式, 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存在矛盾甚至是争执, 会使孩子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容易形成自责心理, 影响其

解决问题的信念, 以至于采取消极退避的应对方式。本研究成果提示, 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要侧重培养大学生们与父母亲的沟通, 注重家庭对孩子心理的培养和家庭和谐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 这是学校教育不容忽视的一环。在具体的实施上可以通过开设一些与家庭教育有关的专题课程, 鼓励学生多与父母进行交流与沟通。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可以通过培养大学生对各种事件正确积极的态度, 纠正大学生们消极、不成熟的应对方式, 提高其应对能力, 有效改善个体的自我和谐状况, 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有压力的情境和事件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许多研究均表明,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17-18]。有研究证实, 应对方式也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19]。本研究发现, 积极应对与抑郁、焦虑情绪得分呈负相关, 消极应对得分与焦虑、抑郁情绪呈正相关。以往的研究显示^[20], 遇到压力时, 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应对方式影响压力的应对效果对应激反应起到缓冲作用其与适应性结果关系密切将直接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积极应对在应激事件及负性情绪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属于心理健

康的保护性因子。提示要重视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指导与矫正,帮助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培养积极和心理品质,以积极的方式去应对面临的压力,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应对方式在家庭环境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作用。Brummett 等^[4]提出,应对方式/策略是应激与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不同的应对策略将直接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及疾病治疗、康复状况。本研究探讨了应对方式作为家庭环境对焦虑和抑郁情绪影响的中介变量,结果表明,家庭环境可以直接影响大学新生的焦虑、抑郁情绪,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间接的影响大学新生的焦虑、抑郁情绪,应对方式起到部分中介效应。由于家庭环境尤其是家庭客观环境是很难改变的,但通过减少或避免个人消极应对方式,建立积极应对方式,对于改善焦虑抑郁有积极作用^[21]。因此,在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维护和提高方面,应关注应对方式的评估,鼓励大学新生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如解决问题、转移注意和求助,进而提高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研究设计为曹建琴,研究实施、资料收集为吕婧、才运江、王晶,论文撰写为吕婧

参 考 文 献

- [1] 陈坚,王东宇.大学生存在焦虑与抑郁:自我同一性的双重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3):443-445.
Chen J, Wang DY. Relationship Between Existent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elf-identity's Double Effects[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3, 21(3): 443-445.
- [2] 阳德华.大学生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5):352,355. DOI: 10.3321/j.issn:1000-6729.2004.05.025.
Yang DH. Psychosocial Factors Having Influence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04, 18(5): 352, 355.
- [3] 吴惠娟,沈鉴清,骆宏.家庭环境对初高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05,26(8):683-684. DOI: 10.3969/j.issn.1000-9817.2005.08.033.
- [4] Brummett BH, Babyak MA, Mark DB, 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f perceived stress in cardiac patients[J]. Ann Behav Med, 2004, 27(1): 22-30. DOI: 10.1207/s15324796abm2701_4.
- [5]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 [6] 费立鹏,郑延平,邹定辉.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增刊),1993(7):93-101.
- [7] 解亚宁.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2):53-54.
- [8] 吴文源.焦虑自评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235-238.
- [9] 张明圆.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2版.长沙:湖南技术出版社,1998:38-40.
- [10] Wu X, Tao S, Zhang Y, et al. Low physical activity and high screen time can increase the risk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poor sleep qualit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J]. PLoS One, 2015, 10(3): e0119607. DOI: 10.1371/journal.pone.0119607.
- [11] 冯凤莲,王春洋,王誉然,等.医学院校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调查研究及成因分析[J].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18,39(6):636-639,644. DOI: 10.3969/j.issn.1007-3205.2018.06.005.
Feng FL, Wang CY, Wang YR, et 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2018, 39(6): 636-639, 644.
- [12] 辛自强,辛素飞,张梅.1993至2009年大学生焦虑的变迁:一项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6):648-653.
Xin ZQ, Xin SF, Zhang M. Changes in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Level in 1993-2009: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J].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011, 27(6): 648-653.
- [13] 潘彦琦,张小红.浅析高中生的焦虑、抑郁与家庭环境的关系[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7,44(1):98-101.
- [14] Brubeck D, Beer J. Depression, self-esteem, suicide ideation, death anxiety, and GPA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divorced and nondivorced parents[J]. Psychol Rep, 1992, 71(3 Pt 1): 755-763. DOI: 10.2466/pr0.1992.71.3.755.
- [15] 付海荣,陈学彬,秦晓民,等.家庭环境对医学生心理健康、人格、应对方式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06(10):84-88.
- [16] 张宇珊,李欣,王颖,等.青少年首发抑郁障碍病人家庭功能和家庭环境调查[J].护理研究,2018,32(12):1953-1955. DOI: 10.12102/j.issn.1009-6493.2018.12.038.
Zhang YS, Li X, Wang Y, et al. Survey of family function and family environment in adolescents with first depressive disorders[J]. Chinese Nursing Research, 2018, 32(12): 1953-1955.
- [17] 郑红.大学生压力应对研究中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探索,2006,5(4):110-111. DOI: 10.3969/j.issn.1002-0845.2006.04.054.
- [18] 郭楠.大学生心理压力和应对方式研究述评[J].医学教育探索,2006,5(4):383-383,封三. DOI: 10.3760/cma.j.issn.2095-1485.2006.04.044.
Guo N. A Commentary of Researches o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Tackling Styles[J]. Researches in Medical Education, 2006, 5(4): 383-383, cover 3.
- [19] 黄志杰,李玉婷,黄美琪,等.广州地区医学生家庭功能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中华全科医学,2015,13(2):295-298.
Huang ZJ, Li YT, Huang MQ, et al. Status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of Guangzhou[J]. 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2015, 13(2): 295-298.
- [20] 孙洪礼.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8):1229-1233. DOI: 10.13342/j.cnki.cjhp.2016.08.031.
Sun H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Coping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6, 24(8): 1229-1233.
- [21] 陶宁,张建江,刘继文.新入伍军人抑郁情绪与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的关系[J].环境与职业医学,2018,35(6):489-494. DOI: 10.13213/j.cnki.jeom.2018.17749.
Tao N, Zhang JJ, Liu JW. Relationship of depression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oping styles of recrui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Medicine, 2018, 35(6): 489-494.

(收稿日期:2018-07-10)

(本文编辑:赵金鑫)